试论晋商的封建性

刘建生　刘鹏生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驰骋中国商界500余年，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肯定晋商崛起、兴盛及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它的封建性。这种封建性不仅表现在晋商自身的经营活动保留着旧式商人的基本特征，还表现在它与清政府结成的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中，表现在它与手工业经济的联系上。对于近代工业，不同时期的晋商采取了迥乎不同的态度，其间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晋商由封建商人向近代资本家转化的重要标志。

一、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

晋商之发端、崛起与封建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其兴盛，这种联系更为普遍、深入，这是晋商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19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山西票号商人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与清政府的联系步步升级，已大大超过了民间商帮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以至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票号的兴亡。这恰恰反映了晋商的封建性特征。

（一）资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并广交官吏

据史书记载："各省试子入都应试、沿途川资，概由票庄汇兑。川资不足，可向票庄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喜欢垫款，替他运动差事。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也由票号先垫，寒儒穷官感激票庄济急，一旦发达，则公私款项尽存于票庄"。①同时，大德恒票号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都有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居住。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掌柜邢象宾出入张之洞督府衙门如走平路。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老板引他在票号帐房会见李鸿章的。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没有票号的帮助，是难以成功的。他们想升官发财，常靠票号予以运筹。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赃款10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1万两，10年取完，不计利息。著名的光绪八年"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时挟光绪帝逃出北京，亡命西安，途经太原，住山西巡抚衙门，经济困难，难得开支。于是，慈禧太后在衙门宴请驻太原各票号人员，并请求借款。大德恒票号贾继英慷慨应允借银40万两，而东家则犹豫不决，经大掌柜阎维藩劝导，令贾骑马追至介休递交款项，故事后有贾继英被召入京，赐穿黄马褂，着徐世昌伴陪，徐贾结为盟兄弟等事。慈禧一行经过晋中几县时，住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光绪皇帝甚至传旨，电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的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为清廷总出纳。

（二）东家与掌柜直接捐纳买取官衔和封典

咸丰时，为筹措镇压农民运动的军费，清政府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社会下层人士或各级官吏，要取得官衔和封典，可向政府捐纳银两。这时，日升昌、蔚泰厚、元丰玖、协和信、志成信、协同庆票号的东家和主要掌柜，捐纳银两买得了各级职衔。平遥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故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 7 人及下一辈男子 12 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掌柜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 5 代 31 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夫人”、“恭人”，冠冕堂皇。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偘受花翎员外郎，兄弟 10 人均花翎顶戴。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铸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遂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 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帐局捐资“铸炮”共用白银 34 万两，钱 7 万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 13 家票号又捐银 6 千多两。咸丰二、三年(1852—1853 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 267 万两。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上的特权。

(三)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官与商朋比为奸

“咸丰初年，筹饷例开，报效者纷纷，大半由票商承办其事，而营业渐次扩张。”②各地捐生因为道路遥远，银两难于携带，又恐盗贼抢劫，故托票号汇兑。至于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官，还需向票号打听消息。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更高的官位，亦请票号代办“印结”(一种签有印签的证明文书)。捐官谋缺者之所以请票号代办，是因为他们直接向户部交款，库内必有若干挑剔，层层关卡，层层剥皮。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交款无阻。当投捐者取得实官，自然对票号感激不尽，于是个人的私款，贿赂的横财，尽存票号，票号可以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存户部，在省存藩库。但官吏却将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

(四)汇兑公款，解缴税收，借垫款项，钻入了清政府财政体系

随着晋商家数增多，机构扩大，金融能力增强，山西票号逐渐发展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据不完全统计，从 1865 年至 1898 年，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各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各关通过票号汇兑公款达 15870 余万两，1862 年为 10 万两，1893 年扩大为 525 万两，32 年里增长了 52.5 倍。

山西票号不仅为清政府汇兑公款，解缴税收，而且还为各省借垫京、协各饷，解救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粤海关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十六年(1864—1890)先后请协成乾、志成信、谦吉升、元丰玖、新泰厚借垫“西征”军费、洋务经费等款项 142 万两。其他如闽海、浙海、淮安、太平各关与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均大量由票号借垫财政款项，甚至军队调防途中也要向票号借款。光绪十一年(1885 年)甘军两营由京撤防回甘，行经山西汾州，檄令“将东南各勇即在晋境遣归”，但无川资，只得向平遥票号借银数千两以充遣返川资。

随着发展，票号代理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最初仅仅是少数省关，以后互相效尤，以至上解京师的款项“无论交部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③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票号

曾一度惊恐彷徨，纷纷收帐观望，以至造成京师及各地银根奇紧。但是，它们对政府官吏的业务却仍然尽力去做。至于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票号则尽最大努力予以支持。“倭韩事起，征兵购械，需款浩繁。本年(1894 年)八月间，当经臣部(户部)解派司员，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 100 万两，备充饷需”。④接着户部又要各省息借商款，解部备用，并订有《息借商款章程》，汉口日升昌票号曾为湖北省提供借款 14 万两。在江西，这种借款“随收随交蔚长厚、天顺祥两票号汇数存储，另立清摺计数，听候藩台文批，发交该二号汇解。”⑤

1901 年 9 月，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 45000 万两，年息 4 厘，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223 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外国侵略者。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在办理如此庞大的公款汇兑中，票号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利用收汇交汇的时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项。据蔚丰厚票号一个职员回忆说：“宣统元年(1909 年)我在西安驻班时，陕西烟酒公卖局、电报局、税务局的上解银两，都由我们蔚丰厚拨兑，一般存银三、五千两，有时上万两，就地解藩库。公家款一般不计利。”因此，山西票号拥有了巨额资金。

票号与清政府勾结，是因为它需要封建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帐的业务利益，而清政府也需要票号的汇兑机构和资金通融。由于阶级利益一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和财政困难，使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各票号不同程度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机构，脱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而钻进了封建政府的财政体系之中。这时，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已经蜕化变质，这是山西票号衰败的根源之一。票号的相当一部分资本经政府之手或用于镇压农民革命，或用于对外国侵略者的赔款，要么就是满足王室奢侈生活的需要。即使进行商业放款，也是要么用作商人异地贩运资本，要么用作高利贷发放的资本，却较少用于产业资本的周转，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票号必然让位于新的资本主义信用形式。

二、晋商与封建手工业的关系

晋商发端于开中盐法实行中的盐商。他们除经销运城池盐外，还运销大量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器、铜器、纸张、煤炭、丝绸等等。应当说，封建手工业的发展与晋商的形成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晋商崛起于封建手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山西，绝非偶然的巧合。其崛起与发展提高了传统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明清时代山西的手工业生产呈现出发展局面。但是从更深意义上讲，这种促进作用是肤浅于表面的，也是十分有限的。

(一)晋商对手工业的促进，主要是通过商业，以间接方式起作用的

近代以前，晋商直接控制生产，投资于生产的情况并不多见。当时的晋商是典型的封建性长途贩运的商帮，其足迹北至库伦、恰克图，南至广州、香港一带，东至日本、朝鲜，西到欧洲伊尔库次克等地。其时，各地物产、风格差异很大，商品的互补性很强，同一商品转运后差价甚大，可以从运销中谋取厚利。因此，晋商与生产者的联系十分松散，并不注意提高手工业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多有商品集散地，且商品交易频繁，交易额巨大。但其生产 形式，仍然只是分散的、缺乏资本支持的小生产。如明时“潞绸”生产盛极一时，有织机 1 万 3 千张，但生产者即所谓“登机鸣杼”者就达数千家，每一家的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尽管“潞绸”“贡篚与市外”，晋商将其“转输至省直，流行于外埠，号利薮”，⑥但其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收买转运而

已，并没有真正的介入生产。又如晋商之转运茶叶，虽在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开设数十家加工作坊，但设备简陋。“压制方法极为幼稚”，⑦其意仅在于便于运输携带，并不在乎从中取利。

必须予以专门分析的是清朝运城池盐的生产，据记载，当时池盐的年产量达到 400 万担，“每岁浇晒之时，工作人夫盈千累万”，⑧且投资者皆为“坐商”。这不免令人疑惑，晋商为什么对家庭手工业漠然视之，而唯独对盐的生产情有独钟？我们知道，盐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商品。盐税收入是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所以，盐的生产始终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制盐业的发达是政府经济繁荣的表现。清代的山西盐商是典型的特权商人，他们与封建王朝在经济、政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盐商在康、雍、乾三朝参与政治、军事斗争，如输送军粮到平定准噶尔叛乱前线，为清统治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商人神通广大，他们投资于盐业生产，是以一定的特权为基础的。所以，并不能以此作为晋商主动投资于手工业生产的佐证。

（二）晋商利润大量流向土地，或者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未能对手工业生产形成有力促进

受我国封建社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利润大量流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据张四维《条麓堂集》卷 28 记载，蒲商范世达经商西北“久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清高宗实录》卷 948 乾隆三十八年（1778 年）十二月己丑记载：“浑源、榆次二州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是以丁粮分征，今户籍日稀，且多置买田地”。而且，还有不少山西商人到外省购买田地。《清高宗实录》卷 1255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五月壬申条载，豫省连年荒欠，凡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清人孙珩《归田稿文》卷 6 载：“前年豫省被灾，惟郏县为重，……西商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召县经商获利数十万银两，购买田地使其土地在数年内“猛增到 600 多顷”。与坐享其成的土地地租相比，手工业生产的利润率低，且很不稳定，自然引不起晋商的青睐。清朝，山西由商人向大地主转化者屡见不鲜，如襄汾刘氏、康熙时临汾亢氏、祁县乔氏、乾隆时阳曲的“百万绳中”等等。而由商人向大产业主转化者殊为罕见。

除投资于土地外，晋商的大量商业利润还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据《清高宗实录》卷 1255 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河南连年歉收，“而晋省富户恃其素积多资，遂乘中州荒欠，前往举利放贷”。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康熙时，全国有当铺 22357 家，其中山西 4695 家，占 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生产者由于资金积累不足，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陷入了困窘不堪的境地。

（三）山西票号亦没有完成和封建手工业的结合

道光年间（1823 年左右），平遥富商雷履泰等人创立票号，经营异地之间的汇兑业务。票号的产生是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票号创立后，发展很快。到 1851 年，总数已达 11 家，其分号则已遍设于长江南北。晋商资本开始由纯粹的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晋商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票号自其产生时，就经营与汇兑相结合的存放款业务，随着业务的扩大，其资本愈加雄厚，营运资本的数额更是巨大。这一时期，晋商对全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但遗憾的是，票号亦没有完成与封建手工业的结合。为票号所青睐的顾客大都是大商业，而与手工业无缘。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商业资本数额巨大且融通频繁，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在我国封建社会大商业利润远远高于手工业生产的利润，由商业起家的山西票商自然深谙其中的差别。

（四）晋商的商业投机活动对手工业起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晋商是封建性的商业集团。在以分散的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海洋中，它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进行各种商业投机活动。封建性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本来是农户耕作之外，“上完国课，下养老幼”的必要补充，其力量薄弱，没有抵御商业资本盘剥的能力。利润大部分都流入了晋商的腰包，这对小生产者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如道光年间，山西寿阳县的棉花买自栾城，统计全县每年不过使用数千驼。道光十五年左右，棉花薄收，“而旧日之积蓄尚有数千驼，亦足资一年之用。而富商六、七、八人故以高价尽数买积，以专其利，每驼非六七十千不售，”竟致全县纺织户皆“停机住纺”，⑨足见其危害之巨。

商业资本还和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对农民的盘剥。这是商业资本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极为流行的形式。商业资本往往利用农民急需生产或生活资料，贷给农民现款或实物并要农民以手工业产品的形式抵偿债务，这就是所谓的预购。其价格往往被压低到不能保本的程度。此外，商业资本常常利用现金缺乏的困难，将农民急需的生产或生活资料，临时“赊”给农民，而要农民在一定期限内以现金支付，是为赊销。为了能够还清债务，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生产的商品竞价出售，而不追求利润的取得。

三、晋商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序幕。洋务运动前期，主要创办的是官办军事工业。这些工业的创办者和所有者不是私人资本家而是清政府及其官僚军阀，创办经费不是私人积累起来的资本，而是清政府的国库开支，经营目的不是为了利润，管理上因循守旧，颇似封建衙门，设有大臣、督办、总办、会办等大小官吏。这些人大多毫无生产知识，只谙贪污、中饱、营私、舞弊。招募工匠上，亦受到许多封建束缚，江南制造局在开办时，甚至明文规定工人“不令随意去留。”⑩这样的工业，自然未能引起晋商的注意。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已无力再支持官办军事工业的发展。洋务派被迫进行了经济调整，提倡民间集股，创办民用工业。民用工业使用大机器生产，为了获取利润进行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工人由各厂自由招雇。这些企业虽然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值此洋务运动中兴之际，也正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如光绪七年(1881 年)，仅汉口一地就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32 家。⑪但是票号与民用工业也没有能够结合，致使中国近代工业错过了一次良好的融资发展机遇。从晋商方面来看，原因主要在于：封建高额地租率、封建性大商业、汇兑业的高额利润依然对晋商产生磁石般的吸引力，吸引了晋商大量的资本；在内部管理上，晋商实行财东无限责任制。即使久居南方的一些分庄经理有创办工业的愿望，但大财东蛰居山西，未能受到洋务风气的多大影响，他们没有洞察到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近代工业的认识也很肤浅，缺乏投资于其中的兴趣。

到本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晋商以高度的热情参与了中国的工业化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铁路的兴修，航运的建立。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大力倡导修筑铁路、建立航运。至甲午战前，中国所建铁路全长仅有 400 公里，1911 年则已达到 8168 公里。航线长度、轮船吨位等也均有大幅度增长。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大大降低了货运成本，长途贩运再无厚利可图，晋商手中的大量资本只能从商业中转移出来另谋出路。其次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使晋商中的一部分由旧式的封建商人转化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或兼有地主身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头脑和眼光都超越了一般的地主，愿意也敢于把雄厚的资本投诸于生产领域，其中有影响的人物很多，著名的有渠本翘、刘笃敬、乔雨亭、王用霖、刘懋赏、冯济川等人。但当时晋商经历了苏俄革命、外蒙独立、辛亥革命等多次大变故后，元气大伤，在全国的势力迅速缩小。他们对工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山西境内，其开端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是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雨亭以5千两银子的价格合伙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购下，又添入资本1万3千两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并获得成功，所产火柴供不应求，遍销秦晋两省。到30年代初，双福财产增殖到20万元，为其最初投资的10余倍，渠、乔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双福火柴公司的成功创办，引发了当时山西社会人士投资近代工业的兴趣。1915年，闻喜商人段连岭等集资10万元，创办荣昌火柴公司，1916年平遥人赵鸿漠等集资9万元，创办金井火柴公司，1923年新绛人王延甫集资10万元创办毓华火柴公司，1924年平遥富商冀全义集资6万3千余元在汾阳创办昆仑火柴公司。火柴工业之外，纺织、面粉等行业也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近代企业。

但晋商投资转向近代工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凭借的依然是在早期创业时的那种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如新绛纺织厂，1900年清政府官办未成，从1910年起绅商集股多次重办，几起几落均无所成，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但晋商终未放弃努力，1927年新绛程关庄商业资本家李通、李玉山父子在前人的遗址上成功的建立了有6048枚纱绽的"大益成纺织厂"，其规模尽管不大，却称得上是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肇始。

从主观意愿上讲，晋商已愿意并积极探索投资于近代工业，从舆论环境上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在鼓励、提倡新兴工业。一战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不仅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而且还增加了对华商品的需求。1916年中国商品输出总值比1913年增加了19.4%，可以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同民族资本产生初期相比，这时大批投资数额较大的厂家出现，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从投资方面上看，这一时期的热点主要是在棉纺、面粉、卷烟等轻工业部门。这也是符合近代工业成长规律的正常现象。重工业虽然也有利可图，但同轻工业相比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时间长，利润率低，技术、管理水平要求高，所以不能成为投资者的首要选择。然而，山西的情况并非如此。保矿运动的爆发使晋商投资开始集中于冶矿事业，其中著名的有山西保晋公司。

保晋公司在其经营前期曾取得很大成绩。1916年盈利43万元，以后逐年盈利，至1921年累计达80万元。⑫1915年，山西选送到巴拿马展出的不同种类的煤炭在博览会上引人注目。它以上乘的品质、繁多的种类初次在外界崭露头角，被外国行家誉为"煤中皇后"，而名满天下。1917年，晋煤开创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口。当年经天津海关出口的晋煤为1007吨，约值海关银45315两，共折合银元约7886.3元。主要销往日本大阪及香港。1920年，因"保晋公司……日可出煤四、五百吨，囤积于潦垣之内者煤炭山积，约计在一万列车以上，现拟在塘沽设立分厂，转运出口，销往外洋。"⑬所设分厂称"保晋海外分销处"。经分销处广事招徕，加强推销、从而使本年度晋煤出口首达万吨。是年津海关册载，晋煤"输往外洋7546吨，香港3555吨，合计出口11096吨 。每吨价格提至6.75海关两，总值74898海关两。1923年晋煤出口额骤增至44748吨 ，货价总值362450吨，平均吨价8.1海关两，创旧中国晋煤出口史上最高纪录。⑭但是由于它的重工业性质，经营中遇到很大困难，如保晋公司自创办之日起，便经常发生资金困难，幸赖晋商全力支持，为其做资金后盾，才得以维持下来。总公司下设的晋城分公司，在晋城北门外的七里店选址采煤。该矿煤质优良，产量较高，但由于负责人缺乏近代重工业的管理经

验，机构设置庞大、工资高、开支大，致使煤价居高不下，最后只得呈请总公司停采歇业。

综上所述，颇具财力的山西商业、金融业资本，在明清及鸦片战争后对传统手工业生产虽通过长途贩运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这种作用较小。由于其封建性质，决定了它与封建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其投资取向主要限于流通、汇兑、存放款、高利贷及购买土地，以谋取异地之间的地区差价、汇率利息及高额地租，从而使其失去了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向近代工业投资的机遇，滞缓了封建商业、金融业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进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晋商开始尝试这一转化，且显示出极旺盛的活力和主要向轻工业投资的热情，但由于保矿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其投资取向转向了投资大、见效慢、效益低、周期长、调整难并受运输等诸多条件限制的煤矿业。这一超常规、跳跃式的变化，致使其陷入资金大量积压、周转困难的窘境，再加上国内外原来一些有利于晋商发展的条件相继丧失，以及煤炭采掘、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最终导致晋商尝试向工业资本融合的失败及其自身的灭亡。

---

①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

②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

③《论官商相维之道》，《申报》1883 年 12 月 3 日。

④清档：户部档，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户部复议侍郎寥寿恒议提各省公款归官借的奏摺》。

⑤清档，《朱批奏摺》，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江西巡抚法馨奏摺附片。

⑥乾隆朝《潞安府志》卷 8，18 页下；卷 34，1 页上。

⑦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第 108 页。

⑧《清盐法志》，卷 34，课额上。

⑨祁隽藻：《马首农言》，第 26 页，“物价粮价”。

⑩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⑪《山西票号史料》，第 64 页。

⑫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66 页。